

廖久明 著

中国现代文学 史料研究举隅

——鲁迅、郭沫若、高长虹及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廖久明 著

中国现代文学 史料研究举隅

——鲁迅、郭沫若、高长虹及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举隅/廖久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5161-1627-2

I. ①中… II. ①廖…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集 IV. ①I20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19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7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从史料工作做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代序)

中国现代文学史需要重写，这几乎成了学界共识，但从提出“重写文学史”后出版的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尽管收录作家范围更广，评价更公允，总的说来却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在笔者看来，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在还不是写出一部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状况的文学史的时候！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就那么三十多年，并且几乎从有中国现代文学起就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此一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有九十多年时间了，怎么可能还时候未到呢？先来回顾一下这九十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程。尽管几乎在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同时便有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因其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距离而难免产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现象。并且，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前尚未形成一门独立学科，对它的研究多是零散性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立即被纳入了意识形态建构之中，1950年5月教育部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内容明确规定：“要求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讲述。”按照这样的标准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面对资料极端缺乏的现状，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中国现代文学资料建设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现在使用的很多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便是在这—时期整理出来的。一则由于当时人们思想还未完全解放，二则由于时间太短暂，随着1985年“方法年”的到来，人们几乎一窝蜂地去搞理论阐释，资料整理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没有充分占有原始材料，这样研究出来的结果有说服力吗？随着近几年人们对史料的重视，不少人开始了自己挖掘原始材料的工作，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常常给人大吃一惊的感觉。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应该以全新的眼光系统地整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散兵游勇式的资料挖掘不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其作用也非常有限。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就来谈谈自己的亲身体会吧。

就中国现代作家而言，《鲁迅全集》至少应该是最全的全集之一。但是，出于写作《一群被惊醒的人——狂飙社研究》的需要，笔者在通读《莽原》周刊和半月刊时竟然发现有近二十则广告未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不包括12则《正误》）。在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收录了部分广告、刘运峰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收录了30则广告的情况下，竟然在鲁迅主编的、著名而常见的《莽原》上发现这么多鲁迅佚文，笔者不能不感到惊讶。笔者由此想到，由于鲁迅一生办了不少刊物，在鲁迅主办的其他刊物上应该还能发现鲁迅佚文。由此可知，哪怕是“尚可挖掘的余地显然十分有限”^①的鲁迅佚文仍有挖掘的余地。

与《鲁迅全集》相反，《郭沫若全集》“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全的作家‘全集’之一”^②。为了“用具体事实说明重新出版《郭沫若全集》的必要性”，笔者曾经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的《郭沫若著译系年》提供的篇目，运用电脑查找功能，逐一查找未收

① 陈漱渝：《序》，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② 魏建：《郭沫若佚作与〈郭沫若全集〉》，《文学评论》2010年第2期。

入《郭沫若全集》的文章。结果令我惊讶万分:“单就‘系年’收录的文章篇目而言,就有1700余篇文章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若加上已发表却未收入‘系年’中的文章,再加上郭沫若大量未发表的文字,真不知到底有多少文字未收入《郭沫若全集》。”^①需要强调的是,这“1700余篇”仅指已经收入《郭沫若著译系年》的文章,遇到那些未收入“系年”的文章,哪怕笔者已经发现也未将它们统计进去,如:《郭沫若书信集》和《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共收郭沫若书信838函,但笔者只统计了270余函,意味着还有560余函未统计进去。试想想,依据这样的《郭沫若全集》研究得出的结论到底有多大可信度?

笔者研究较多的第三个作家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那么受重视的高长虹。尽管高长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受重视,笔者在研究他的过程中却有意外收获。首先,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幻想与做梦》和鲁迅的《野草》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语体’散文或象征主义散文诗的源头,尽管称高长虹为‘散文诗集的开先河者’与事实不符,却完全可以称他为开创者之一”;通过比较高长虹的《土仪》和鲁迅的《朝花夕拾》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说法属实,那么开创现代散文‘闲话风’创作潮流与传统的系列文章应该是《土仪》而不是《朝花夕拾》。”如果笔者的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以下说法便应该修改: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开创了现代散文的两个创作潮流与传统,即‘闲话风’的散文与‘独语体’的散文”^②。其次,笔者提出了“第二次思想革命”的观点。笔者在阅读高长虹作品过程中发现,他在多篇文章中提到1925年北京出版界有过一次“思想运动”:“去年一年北京的出

^① 廖久明:《未收入〈郭沫若全集〉的历史、考古作品目录》,《郭沫若学刊》2006年第3期。

^②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版界，因为特殊的时局的缘故，思想上引起一个小小的运动，这运动因为艺术的色彩比较多些，所以一般读者们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但这个运动，虽然没有那样普遍，但比《新青年》运动却深刻得多，它是会慢慢地踏实地表现在事实上呢。其中虽然也不是没有派别，但当时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就形式上说，可分为《莽原》，《语丝》，《猛进》三派，然而大致都是由思想的自觉而表现为反抗；而所反抗的在大体上又都是同样的目标”^①；“去年的出版界是有过一次运动的，大致由对外而转为对内，由反章而转为反现代评论社，对内与对外，是号称全国一致的，然而在我们好谈思想的看起来，却是反章，尤其是反现代评论社的意义深且远。这不但是被压迫者反压迫者的运动，而是同情于被压迫者反同情于压迫者的运动，是士人中的不阔气的士人反阔气的士人的运动，是艺术与思想反士宦的运动，是真实反虚伪的运动，是人反非人的运动”^②；“大家想来知道当时引人注意的周刊可以说有四个，即：《莽原》，《语丝》，《猛进》，《现代评论》。《莽原》是最后出版的，暂且不说。最先，那三个周刊并没有显明的界限，如《语丝》第二期有胡适的文字，第三期有徐志摩的文字，《现代评论》有张定璜的《鲁迅先生》一文，孙伏园又在《京副》说这三种刊物是姊妹周刊，都是例证。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虽然内部的同异是有的，然大体上却仍然是虚与委蛇。最先对于当时的刊物提出抗议的人却仍然是狂飙社的人物，我们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我们同鲁迅谈话时也时常说《语丝》不好，周作人无聊，钱玄同没有思想，非攻击不可。鲁迅是赞成我们的意见的。而鲁迅也在那时才提出思想革

①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今昔》，《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129页。

②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旧事重提》，《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命的问题”^①……看了这些文字后再来看胡适、鲁迅等人 1925 年前后的文章、书信，笔者惊讶地发现，1925 年前后，面对“‘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的社会现实，胡适、鲁迅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将《新青年》未竟的使命继续下去的主张：“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基础建筑一个可靠的基地”^②；“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③。很遗憾的是，这次思想革命开始不久五卅惨案便发生了，人们的注意力再次由思想革命（“启蒙”）转向了严酷的现实（“救亡”），“救亡”就这样再次压倒了“启蒙”。尽管人们对“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有较大争议，但是就五卅惨案与“第二次思想革命”而言，笔者认为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总之，写文学史确实应该抓大放小，否则便是一种“‘博览旁搜’，以量取胜”^④。不过，写文学史应该先研究再筛选，而不应该先筛选再研究，只有在对所有对象进行充分研究的前提下才能知道哪些该抓、哪些该放。若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可能因为不了解而放弃那些本该抓住的内容，却让那些本该放弃的内容滥竽其间。并且，结构主义告诉我们，“现实的本质并不单独地存在于某种时空之中，而总是表现于此物与它物间的关系之中”^⑤。就是为了研究重要作家和重大现象，也应该将其与相关作家和现象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重要作家的重要性和重大现象的意义所在。这一切，都离不开史料工作。

① 高长虹：《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高长虹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

②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与一涵等四位的信》，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页。

③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④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⑤ [美]沃野：《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学术研究》1996年第12期。

目 录

从史料工作做起: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途径(代序)	(1)
--------------------------------	-----

一 思想研究

救亡再次压倒启蒙

——五卅运动与“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3)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鲁迅	(17)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何以“轰毁”	(22)

二 作品研究

高长虹,“独语体”、“闲话风”散文潮流的开创者之一	(37)
---------------------------------	------

白猫也是猫

——高长虹短篇小说《结婚以后》解读	(56)
“性的烦闷”对高长虹创作的影响	(63)
《奔月》人物原型分析及高鲁冲突中的鲁迅、许广平	(75)
也谈《铸剑》写作的时间、地点及其意义	(83)
谈谈鲁迅时期的《莽原》广告	(96)

新酒装在旧瓶里

——从编排情况看《女神》的“地方色彩”	(122)
---------------------------	-------

正题戏说

——《马克思进文庙》的我见	(129)
---------------------	-------



廖名春先生的《毛泽东郭沫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唱和诗索隐》的我见 (141)

三 史实研究

冯雪峰与“两个口号”论争

——兼谈 2005 年版《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 (149)

鲁迅偏袒胡风吗 (169)

鲁迅与田汉 (175)

“便是阅墙的兄弟应该外御其侮的”

——略谈郭沫若 1936 年的三件事 (182)

论金钱因素对高鲁冲突的影响 (191)

高长虹与周作人

——从路人到仇人 (200)

高长虹与阎宗临

——亲如兄弟 (231)

狂飙社成立时间考证 (245)

莽原社·狂飙社·未名社述考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68)

后记 (273)

—

思想研究

救亡再次压倒启蒙

——五卅运动与“第二次思想革命”的夭折

1986年，李泽厚在《走向未来》创刊号上发表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把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概括为“救亡压倒启蒙”^①，这一观点在获得一片喝彩声同时也渐渐遭到一些人质疑。2002年，李杨在《书屋》第5期上发表了《“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通过对‘救亡’与‘启蒙’、‘传统’与‘现代’这一二元对立的解构，尝试提供另一种理论解释，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救亡’与‘革命’，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反而是‘启蒙’这一现代性生长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不但没有‘中断’中国的现代进程，反而是一种以‘反现代’的方式表达的现代性。”^② 一则笔者才疏学浅无法进行“理论阐释”，二则笔者认为事实胜于雄辩，所以本文不拟就“救亡”与“启蒙”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仅以五卅运动为例说明“救亡”是如何压倒“启蒙”的。

① 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9页。

② 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一 《新青年》分裂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

1921年初,《新青年》最终分裂。与五四时期的其他刊物相比,《新青年》有一个显著特点:“从大体上看来,《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新青年》分裂后,文学社团虽然大量涌现:“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到十四年(一九二五),先后成立的文学社团及刊物,不下一百余”,但这些文学社团培养的是“大群有希望的青年作家”,^①而不是“文化批判者”,所以《新青年》的分裂标志着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告一段落。

在《新青年》分裂的同时,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包括:“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②1923年,郑振铎接编《小说月报》后,在“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栏目中发表了《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同时发表了顾颉刚、王伯祥、余祥森、严既澄、玄珠的文章,这些文章“大概都是偏于主张国故的整理对于新文学运动很有利益一方面的论调”^③,郑振铎特别强调“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下去”^④。至此,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在从事创作、翻译的同时,逐渐兼顾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整理与研究。郑振铎在提倡整理国故的同时,还与研究系的张君勱、张东荪等人商议,“创办一份以宣传唯心史观为宗旨的杂志,企图通过对唯心史观的宣传,广结同志,为日后组党作好

① 茅盾:《中国文论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3—461页。

② 编者:《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③ 西谛:《发端》,《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

④ 郑振铎:《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

准备”^①。1923年1月，以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国学季刊》出刊，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②。

1925年5月，初期创造社“圆鼎三脚”^③的郭沫若（另两只“脚”是郁达夫、成仿吾）一如既往地《创造周报》上为孔子高唱赞歌：“我们崇拜孔子。……我们所见的孔子，是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的天才，圆满的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他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如在广度。”^④

在新文化派中的一些人提倡“整理国故”、为孔子高唱赞歌的同时，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复古派却大力提倡东方文化并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攻击。梁启超发出了西方“科学万能的大梦”已经破产的惊呼。^⑤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它”，“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⑥张君勱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⑦学衡派在《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评〈尝试集〉》（胡先骕）、《论新文化运动》（吴宓）等文章中对新文化运动发起攻击。甲寅派的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否认文化有新旧优劣之别，以此否定新文化运动存在的依据和意义。

① 郑大华：《张君勱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7页。

②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季羨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③ 郭沫若：《学生时代·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④ 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王锦厚、伍加伦、肖斌如编《郭沫若佚文集》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⑤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选）》，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黄克剑、王欣编《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192页。

⑦ 张君勱：《人生观》，黄克剑、吴小龙编《张君勱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新青年》分裂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可用鲁迅给《猛进》主编徐旭生的一段话来表述：“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①

面对“‘反革命’的空气浓厚透顶”的局面，原新青年同人联合后来者开始了同异互现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二 同异互现的“第二次思想革命”

（一）《语丝》与“第二次思想革命”

《语丝》创刊虽然起因于一偶然事件，实际上却是新月社争夺阵地的结果：“《晨报副刊》虽然是中国报纸中最早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副刊，而《晨报》本身却是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它的增出副刊，容汇新流，只是为了招徕视听，装潢门面而已。特别是胡适同新从欧洲留学回国的徐志摩、陈西滢等于1923年成立新月社后，就挤进《晨报副刊》这块地盘，占据门户，另立营垒，酝酿着文化战线上的一场新的斗争。一九二四年初，《晨报》当局、某大律师的儿子刘勉己从欧洲留学回来，与新月社气类相似，遂相勾结，取代了蒲伯英成为《晨报》的代总编辑后，就想把孙伏园拉下编辑椅子，把鲁迅等人从《晨报副刊》上排挤出去。但由于鲁迅等人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影响较大，又碍于孙伏园的人际关系，《晨报》当局不无顾忌，所以，箭在弦上，引而未发。等到一九二四年十月，刘勉

^①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己蛮横无理地抽掉鲁迅（署名‘某生者’）的《我的失恋》诗稿的所谓‘抽稿事件’发生，孙伏园为了表示抗议，愤而辞去编辑职务，鲁迅等人也相率退出，《晨报副刊》遂为新月社所占据。为了另辟战线，建立阵地，在鲁迅的支持和领导下，孙伏园另邀了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川岛、顾颉刚、淦女士等十六人，作为长期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并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了创刊号。”^① 故鲁迅说“抽稿事件”发生前，“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②。考察一下《语丝》撰稿人不难看出，他们多是像鲁迅一样，在《新青年》分裂后，“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而“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的人^③。在周作人代拟的《发刊辞》中，交代了《语丝》的办刊宗旨：“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④

后人在总结《语丝》的主要内容时，曾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一、“‘语丝派’的主要成员大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对于弥漫于思想文化界的复古倒退的恶浊空气加以扫荡，就成为语丝派斗争的主要目标”；二、“‘语丝派’的另一个斗争矛头是针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三、“‘语丝派’的另外一条重要战线是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四、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语丝派’的成员对于军阀政府的残酷野蛮，一致予以抨击和揭露，对于惨案的牺牲者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悼念”；五、“‘四一二’以后，‘语丝派’的主要斗争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反动派的”；

① 张梁：《评“语丝派”——兼谈周作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④ 《发刊辞》，《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